

美国政治极化：基于州议会的实证研究^{*}

袁田西竹 谢 韬

【内容提要】 美国政治极化在国内外学术界备受关注，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层面的极化现象，对于州级层面极化的研究仍亟待挖掘。鉴于此，本文以美国各州众议院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州级层面极化现象及其影响因素。首先，虽然州议会与国会都日趋极化，但基于现有的州议会意识形态数据，本文发现各州极化呈现缓慢上升、急剧上升和保持稳定三种趋势，并且州议会和国会的非对称极化表现各异。其次，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2010—2020年各州众议院极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选取明尼苏达州和密歇根州作为比较案例。研究结果显示，族群多样性、制造业规模以及投票便利度对州众议院极化有显著负向影响。本文进一步探究发现，身份政治和经济上的冲击导致白人及工薪阶层思想右转，加剧政治极化，各州的选举政策则通过影响选民参与程度加深州议会极化程度。

【关键词】 政治极化 美国 政党 选举 州议会

【作者简介】 袁田西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yuantianxizhu@bfsu.edu.cn

谢韬（通信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

电子邮箱：xietao@bfsu.edu.cn

* 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2025LJ001）。感谢《国际政治科学》编辑部、匿名评审专家以及付舒助理教授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笔者文责自负。

一、引言

过去二十年,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最受关注的特点之一。2020年总统大选引爆“1·6冲击国会山”事件、因两党在债务和预算上难以达成一致联邦政府数度面临停摆风险、民主党与共和党皆发起对另一党总统弹劾调查,以上事件都体现出当今美国的政治生态深受极化侵蚀。

政治极化通常是指两党内部同质化和两党之间差异化,^①学界相关研究较多关注美国联邦层面极化,将国会作为重要切入点进行考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会议员的意识形态数值显示,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的意识形态差距在参众两院都持续增加。^②与此同时,两党议员的“党派团结指数”(party unity score)自1993年起一直维持在80%之上。^③两党议员以党划线投票倾向加强,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差距拉大,表明国会极化程度不断加深。

毫无疑问,从国会来看,美国政治已深陷极化困境。而在州级层面,极化呈现态势同样值得探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州级政治极化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其一为州内意识形态一边倒,具体表现为特定一党主导州级选举政治;其二为州内两党尖锐对峙,与国会的极化表现类似。鉴于既有研究对州内两党对立的探讨尚不充分,本文将重点关注后一类型。

从州级这一中观层面对极化现象开展分析具有很大意义。第一,在联邦制之下,美国各州拥有较强差异性和独立性,若将全美的极化视作铁板一块,可能会导致结论不全面。第二,美国只有一个国会,但州议会数量众多,能够为极化研究提供更大样本。第三,对政客而言,州议会是通往国会的跳板,探究州议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展望国会未来发展。

基于上述考量,本文以美国各州众议院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州的极化

^① Nolan M. McCarty et al., *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6, p. 24.

^② Jeffrey B. Lewis et al., “Voteview: Congressional Roll-Call Votes Database,” https://voteview.com/articles/party_polarization, 访问时间:2024年9月1日。

^③ CQ Roll Call, “Party Unity History,” <https://rollcall.com/2022/03/01/party-unity-vote-studies-underscore-polarized-state-of-the-union/>, 访问时间:2024年9月1日。

及其影响因素,力图更加全面地解释美国极化的原因及未来走向。本文在现有理论基础上提出假设,认为身份政治、产业结构与选举政策会对州极化造成影响,并利用州议员意识形态数据库对一系列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州的族群多样性、制造业规模、投票便利度都对州众议院的极化有显著负向作用。本文进一步对自变量与极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机制分析,并选取明尼苏达州和密歇根州作为案例予以解释。

二、既有研究与不足

国内外学术界对美国政治极化展开了丰富讨论,但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国家层面极化,州级层面极化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研究。

既有研究围绕国家层面极化加深的动因产生了多元解释,主要可以归结为四种视角,分别是社会经济因素、制度设计、党派重组与特定行为体。第一,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极化程度。具体而言,贫富差距扩大和身份政治问题激化社会矛盾,强化选民的政党认同,选民的党派分化(partisan sorting)现象进而加深国会极化。^①第二,制度设计是影响极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学者们重点关注两党制、选举人团制、封闭式初选制以及国会制度改革对极化的影响。^②此外,还有观点认为,美国国家制度的保守性和美国社会生态的

^① Jeffrey M. Stonecash, Mark D. Brewer and Mark D. Mariani, *Diverging Parties: Social Change, Realignment, and Party Polariz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3, pp. 76-104; Nolan M. McCarty et al., *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6, pp. 71-138; 邵峰:《美国政治极化的现状与未来》,载《人民论坛》,2022年第2期,第19—20页;付随鑫:《美国政治能够去极化吗?——基于美国历史经验和政治制度的分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3期,第110—111页。

^② 谢韬:《美国国会两党分化的原因及后果》,载《国际论坛》,2009年第1期,第67—68页;节大磊:《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美国民主》,载《美国研究》,2016年第2期,第67—72页;王希:《两党制与美国总统选举的“无选择困境”》,载《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第7—8页;张业亮:《美国选举人团制:历史演变、制度缺陷和改革》,载《美国研究》,2021年第2期,第41—42页;John Aldrich, *Why Parties?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241-276.

开放性之间存在内在张力是当下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① 第三,有研究指出当代美国极化源于国内政党重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北方民主党支持民权运动,南方民众大规模投向共和党阵营,加之共和党为吸引保守派选民采取的南方战略(Southern Strategy),政党重组现象发生。随着民主党意识形态日趋自由,共和党意识形态日趋保守,极化程度不断加深。^② 第四,学者们探析了特定行为体在加剧极化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包括政党领导、政党积极分子、新闻媒体、社交媒体等。^③

相较而言,学界探究美国州级层面极化原因的文献较少,且都为定量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有学者探讨了政党竞争激烈程度与州议会极化之间的关系,他们以政党翻转程度、总统大选结果差距、有效政党数量等作为衡量政党竞争的标准,发现州内选举越是激烈,极化程度越深。^④ 还有学者聚焦于州议会选区,认为由两党轮流掌控的摇摆选区在一个州内占比越高,州议会极化越是严重,因为出自这些选区的议员为赢得选举会持更加极端的立场。^⑤ 另一方面,学者们关注个别行为体对极化的影响。

① 赵可金:《老国家与新社会的错位: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第60—61页。

② Earle Black and Merle Black,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Sou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9-272; 王浩:《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动因、走向与影响》,载《美国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第193—194页。

③ David W. Rohde, *Parties and Leaders in the Postreform Hou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11-44; Sean M. Theriault, *The Gingrich Senato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5-50; Andrew B. Hall, *Who Wants to Run? How the Devaluing of Political Office Drives Polar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pp. 51-102; Gerald Gamm and Steven S. Smith, “The Emergence of Senate Party Leadership, 1913—1937: The Case of the Democrats,” https://www.vanderbilt.edu/csdi/events/Gamm_Smith.pdf, 访问时间2024年8月2日; Jaime E. Settle, *Frenemies: How Social Media Polarizes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97-234; Daniel J. Hopkins and J. M. Ladd, “The Consequences of Broader Media Choice: Evidence from the Expansion of Fox News,”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1, 2012, pp. 115-135.

④ Kelsey L. Hinchliffe and Frances E. Lee, “Party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in State Legislatures,” *State Politics & Policy Quarterly*, Vol. 16, No. 2, 2016, pp. 172-197.

⑤ Nolan McCarty et al., “Geography, Uncertainty, and Polarization,”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Vol. 7, No. 4, 2019, pp. 775-794.

有研究指出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党派积极分子对州极化有催化作用。^① 还有研究在发现政治行动委员会和个人捐款者对议员候选人具有不同倾向的基础上,得出限制竞选捐款的规则可能加剧极化的结论。^② 除此之外,研究者们还提到,州议员在其选区内任职经历越丰富、地方根基越深厚,意识形态越不容易走向极端。^③

上述文献为理解美国极化提供了合理解释,但仍然留下了诸多疑惑。归结而言,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三点不足:一是学者们主要关注全国层面,州级极化研究相对匮乏;二是针对州极化的研究样本时间较早,而近年来州议会呈现出的显著变化亦值得分析;三是未对多个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只有在探究州议会极化时对社会经济、选举政策等因素一起进行考量,方可确定影响最大的变量。有鉴于此,本文希望从美国州级政治的视角切入,对极化开展研究。由于州众议院的极化趋势和程度比参议院更为突出,本文将聚焦于州众议院,深入剖析极化的原因,以期对美国是否能破解极化问题有所启示。

三、美国各州众议院极化水平

当前,美国学界在评估立法机构极化程度时普遍采用两种衡量方式:党间差异度与党内一致度。其一,通过每位议员的投票记录可以计算出议员的意识形态数值(DW-NOMINATE),一党意识形态数值便是该党所有议员意识形态数值的平均值或中位值,两党数值之差即为党间差异度。^④ 其二,

^① Connor Phillips, “Interest Groups and State Legislative Polarization,”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23, pp. 42-68; Daniel J. Coffey, “Federal Parties and Polarization,” in John C. Green, Daniel J. Coffey and David B. Cohen, eds., *The State of the Parties: The Changing Rol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arti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pp. 113-125.

^② Michael J. Barber, “Ideological Donors, Contribution Limit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Legislatur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8, No. 1, 2016, pp. 296-310.

^③ Charles Hunt and Stella Rouse, “Polarization and Place-Based Representation in US State Legislature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Vol. 49, 2024, pp. 411-424.

^④ Jeffrey B. Lewis et al., “Voteview: Congressional Roll-Call Votes Database,” https://voteview.com/articles/party_polarization, 访问时间 2024 年 9 月 1 日。

从议员跟随其党派投票的概率可以得到党内团结指数(party unity score)，进而观测两党内部团结一致程度。鲍里斯·肖尔(Boris Shor)和诺兰·麦卡蒂(Nolan McCarty)参照前一测量方式，根据各州议员记名投票(roll call vote)得到州议员意识形态分值，并据此计算出各州两党中位数之差，即州议会极化数值。^①他们在2023年对数据进行更新，数据库现涵盖27080名州议员，时间范围为1996—2020年。^②本文将选用该数据库进行研究，议员意识形态分值为0代表议员意识形态中立，取值为负代表意识形态自由，取值为正代表意识形态保守，由于意识形态分值取值范围为-2到2，因此极化程度的取值范围为0~4。

图1展示了1996—2020年美国各州众议院的极化走势。^③据图可知，各州的极化以三种趋势为主：缓慢上升，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急剧上升，如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保持稳定，如北达科他州、马萨诸塞州。需要指出的是，2010年之后，绝大部分州议会的极化程度增幅进一步扩大。^④

图2展示了各州众议院在1996—2020年平均极化程度排名。尽管极化现象普遍存在，但各州极化水平的差异参差不齐。加利福尼亚州和罗得岛州分别为最极化和最不极化的州，在这二十五年间，加利福尼亚州的平均极化值高达2.75，罗得岛州却仅有0.36，呈现出强烈对比。其他47个州年均极化程度的范围在0.75~2.35之间，呈正态分布。

各州议会同美国国会相比，极化特征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一方面，

① 在2011年之前，学者们常常受到两方面的阻碍：一方面，缺乏各州议会投票记录的数据；另一方面，无法对意识形态值进行州际比较。针对这两个问题，两位学者首先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取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所有州立法机构的点名投票数据。其次，他们使用了由智能投票工程(Project Vote Smart)提供的全国政治意识测试(The National Political Awareness Test, NPAT)数据。全国政治意识测试是对所有联邦和州议员候选人展开的一项调查，调查时会对他们提出相似的问题。由此，州议会极化数据便具有了可比性。

② Boris Shor and Nolan McCarty, “Two Decades of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State Legisla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No. 3-4, 2022, pp. 343-370.

③ 由于内布拉斯加州议会是美国唯一采用一院制的州议会，因此本研究未将内布拉斯加州纳入。

④ 仅怀俄明州和密歇根州两州呈现出微弱的极化下降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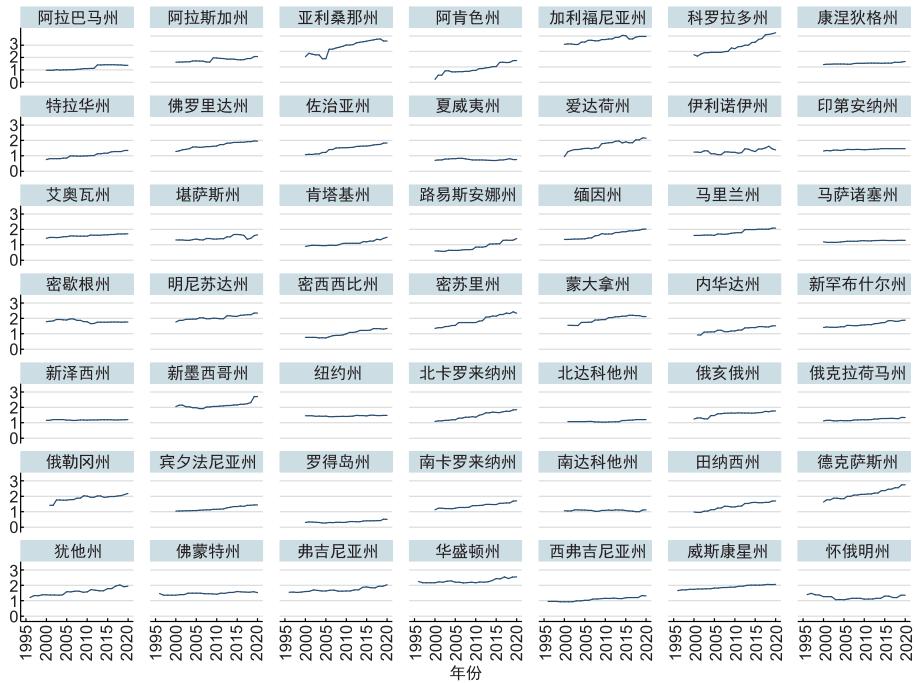


图 1 美国各州众议院极化走势(1996—2020 年)

数据来源: Boris Shor, “Individual State Legislator Shor-McCarty Ideology Data, April 2023 Update,” 2023, <https://doi.org/10.7910/DVN/NWSYOS>, 访问时间: 2024 年 9 月 2 日。

由图 1 和图 3 可知,两者相同点在于从 20 世纪末到 2020 年,全国和州层面的极化程度都在持续加剧,且 2010—2020 年增幅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州议会与国会在两党非对称极化的态势上却截然不同。国会中,共和党向右转的趋势十分明显,民主党向左转的趋势相对温和。^① 如图 4 所示,自 1995 年至 2020 年,国会众议院中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值从 0.397 升到 0.502,而民主党意识形态值从 -0.361 降到 -0.376。可见,共和党“保守化”比民主党“进步化”更加显著。然而,在州议会中,民主党左转的程度却大于共和党右转的程度。如图 5 所示,在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田纳西州等许多州,民主党向左大步迈进,共和党却只是小步前行。

^① Nolan M. McCarty, *Polarization: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4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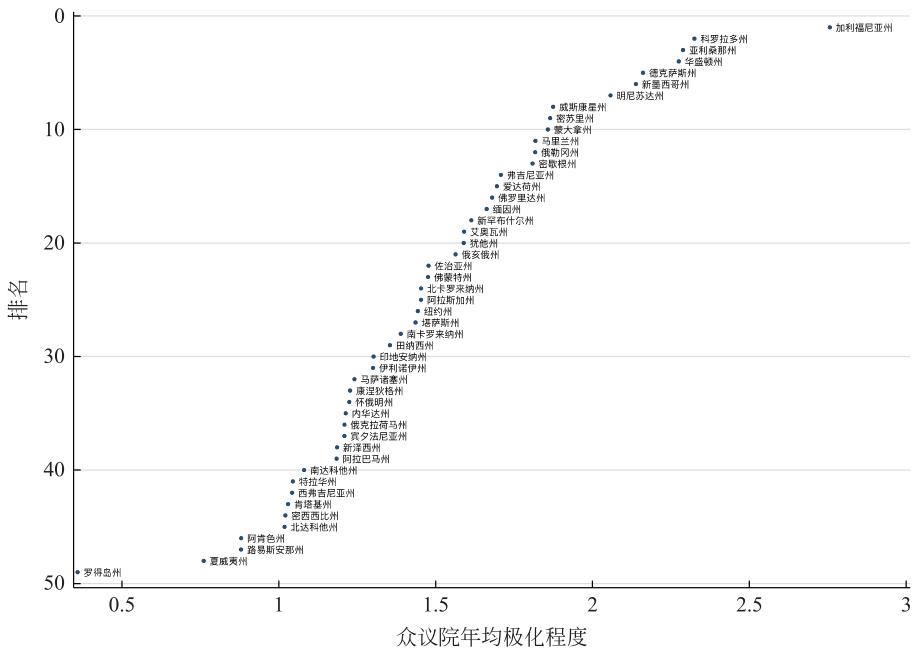


图2 各州众议院年均极化程度排名(1996—2020年)

数据来源: Boris Shor, "Individual State Legislator Shor-McCarty Ideology Data, April 2023 Update," 2023, <https://doi.org/10.7910/DVN/NWSYOS>, 访问时间: 2024年9月2日。

从数据来看,1996年各州众议院民主党意识形态值的范围是-1.49~0.07,共和党的分布范围是-0.18~1.12(见图5),概言之,两党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存在交会地带,但民主党向左比共和党向右更多,且民主党内部分化更为明显。2020年,州众议院民主党意识形态的分布范围变为-1.73~-0.23,共和党分布范围变为-0.09~1.48(见图5)。这意味着民主党议员整体向左移动且缺失绝对中立派,而共和党虽向右转的幅度同样较大但党内仍然有温和派。就历史而言,共和党在州级和全国层面的右转都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民主党的左转则略微滞后。^①然而,过去二十年间,州

^① Matt Grossmann and David A. Hopkins, *Asymmetric Politics: Ideological Republicans and Group Interest Democra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1; Boris Shor and Nolan McCarty, "Two Decades of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State Legisla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No. 3-4, 2022, pp. 343-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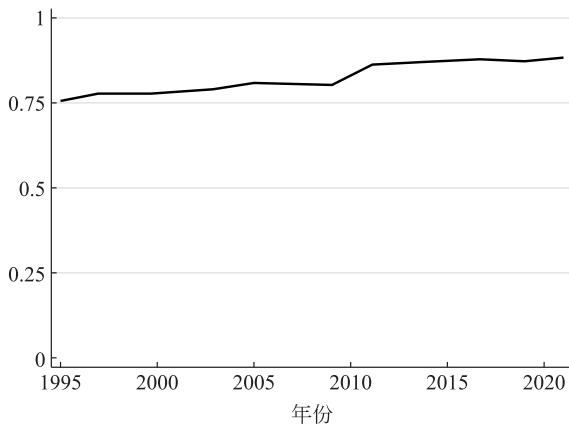


图3 国会众议院极化走势图(1995—2020年)

数据来源: Jeff Lewis, “Polarization in Congress,” 2023, https://voteview.com/articles/party_polarization, 访问时间: 2024年9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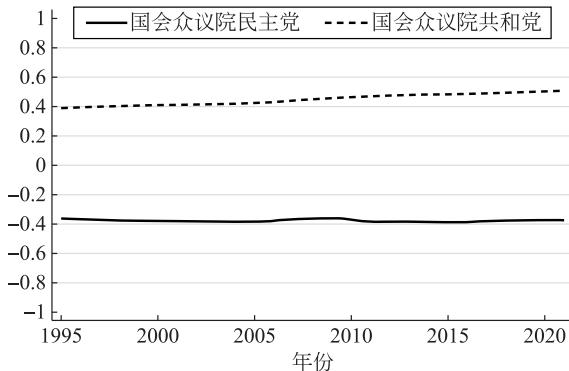


图4 国会众议院两党意识形态分值趋势图(1995—2020年)

数据来源: Jeff Lewis, “Polarization in Congress,” 2023, https://voteview.com/articles/party_polarization, 访问时间: 2024年9月4日。

级民主党人的左转幅度明显领先于国会民主党人,由此观之,尽管在全国层面保守主义势头强劲,但是在州层面,进步主义同样具有强大影响力。

整体而言,在过去二十五年里,各州众议院极化走势以上升和稳定为主,但极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这进一步表明有必要区分维度对极化进行考察。那么,哪些因素会对州层面的极化产生影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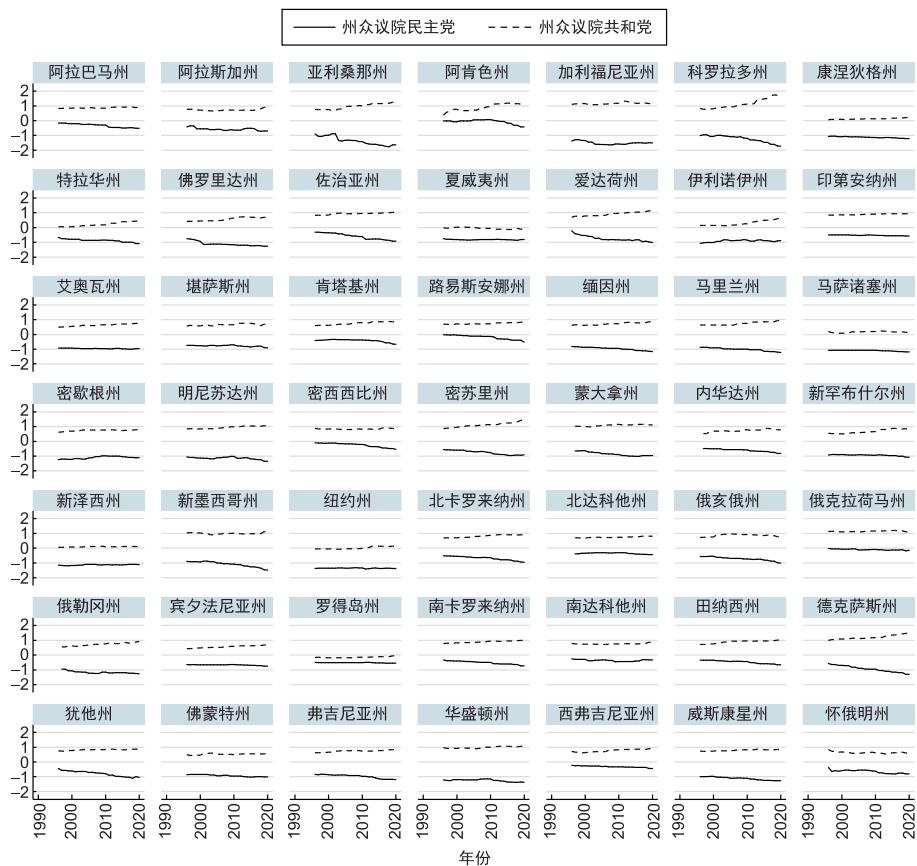


图 5 各州众议院两党意识形态分值趋势图(1996—2020 年)

数据来源: Boris Shor, "Individual State Legislator Shor-McCarty Ideology Data, April 2023 Update," 2023, <https://doi.org/10.7910/DVN/NWSYOS>, 访问时间: 2024 年 9 月 2 日。

四、理论假设

本部分将考察经济、身份及制度三方面因素对极化的作用机理。具体来说,本文将从身份政治、产业结构以及选举政策切入讨论,尽管学界对这些因素已有诸多探讨,但是对近十余年州议会极化是否受其影响在实证方法上鲜有验证。

(一) 身份政治对州议会极化的影响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是理解美国政治的重要维度。美国的身份政治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以黑人、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人群为主体的社会运动,随着移民涌入和族群结构多样化,身份政治逐渐外延至种族与族群领域。^① 学界对身份政治与极化之间关联的讨论已较为深入。

一方面,族群身份作为基础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冲击了美国的传统政治社会秩序,导致多元文化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之争,由此加剧政治极化。^② 由少数群体而起的身份政治激发了保守派白人的怨恨,当自由派和边缘身份群体日益受到重视,传统的白人文化必然遭到排挤,加之曾经的“主流价值观”被认为违反政治正确原则,从而引发白人的抵制情绪,触发白人身份政治。所谓白人身份政治,即为白人的、本土的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了白人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侵蚀美国传统价值观和白人文化的担忧。^③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堪萨斯州的白人蓝领毫不顾忌自己的经济利益,选择投身于文化战争,高呼反同性婚姻、反堕胎、反平权运动的口号。^④ 多元身份政治与白人身份政治形成对抗,刺激着白人日趋保守,极化由此不断加深。有学者甚至指出,美国政治的发展趋势并非走向极化,而是日益走向保守化,保守主义在美国占据着主导地位。^⑤

另一方面,身份政治最初是由左翼的自由主义者推出,但早已成为民

^① 陈金英:《美国政治中的身份政治问题研究》,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79—180页。

^② 牛霞飞:《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政治极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年第1期,第43—46页;James D.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Control the Family, Art, Education, Law,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New York: Avalon Publishing, 1992, pp. 12-17.

^③ 林红:《身份政治与国家认同——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困境及其应对》,载《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37—38页。

^④ Thomas Frank,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How Conservatives Won the Heart of America*, New York: Owl, 2004, pp. 113-137.

^⑤ 赵可金、史艳:《极化还是保守化——冷战后美国政治保守化运动及其根源》,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0期,第32—33页。

主、共和两党的政治竞争工具。在以族裔认同为核心的身份政治下,不同族裔的选民在党派倾向和政治立场上显现出较大差异。民主党主要由自由派白人和少数族裔组成,意图组建“大帐篷”(big-tent)联盟,共和党阵营则以文化保守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を中心。^① 精英构建并强化集体的身份认同以获得或维持权力,^② 在选举策略上,民主、共和两党为吸引选票不断强化身份政治趋势,推动极化加深。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一个州身份政治问题越突出,该州议会的极化水平越高。

(二) 产业结构变化对州议会极化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低附加值产业如加工、制造等被转移到海外,美国本土制造业逐渐衰落,金融业迅速崛起。^③ 众多学术研究已经关注到产业结构变化,尤其是制造业衰退对政治极化造成的影响。随着制造业衰败,就业人数大幅缩减,依赖制造业的中产阶级规模日渐萎缩。^④ 中产阶级在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被视为“民主政治的坚强柱石”“社会稳定的稳压器”。^⑤ 中产阶级遭遇冲击无疑加剧了美国政治和社会分裂。

制造业岗位大量流失、工人收入降低使得工薪阶层陷入经济困境,并引发失业焦虑和经济不安全感。他们将艰难处境归因于全球化、自由贸易,^⑥

① 郭馨怡、谢韬:《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摇摆州:2000—2020年》,载《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1期,第20页。

②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Violenc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4, 2000, pp. 845-877.

③ 黄琪轩:《大国制造业兴衰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9期,第83页。

④ “中产阶级”概念较为宽泛,是介于低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大部分中间群体,但拜登、沙利文等人在公开场合也会混用“中产阶级”“劳工阶级”“劳工群体”“劳工家庭”等类似名词。参见刁大明:《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4期,第16页。

⑤ 韦宗友、张歆伟:《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载《美国研究》,2021年第4期,第94页。

⑥ Justin R. Pierce and Peter K. Schott,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6, Issue 7, 2016, pp. 1632-1662.

因此往往会倾向于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保守立场,这种趋势在白人蓝领群体中尤为明显。^① 有研究指出,白人选民会将制造业萎缩与个人难以向上流动同美国经济整体衰退联系在一起,从而激发他们对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②

除此之外,传统制造业工人的失业以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劳工和移民大量涌入,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进一步增加了民众诉诸极端意识形态的可能性。^③ 对精英阶层的不满和对现有政治经济体制的质疑,为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肥沃土壤。2009年“茶党运动”、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和2016年特朗普上台均为民粹主义兴起的体现。^④ 目前,对于2010—2020年各州极化是否受制造业衰退影响,学界尚未在实证层面达成定论。本文考虑到上述制造业空心化导致极化加剧的机制,将其运用至州议会层面,提出:

假设2: 一个州的制造业规模缩小,其议会的极化程度将随之升高。

(三) 选举政策对州议会极化的影响

在美国的选举制度下,选举管理权力被下放到州及更低层级政府,各州独立控制选举程序,承担计票、核票等职责。不同州施行的不同选举政策会对选举资格限制程度及选民参与投票意愿造成差异化影响。民主党和共和党为在选举中争取有利条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选举策略。例如,美国目前有36个州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出示某种形式的身份证明,其中21个州要求选民出示的身份证件需附有照片,例如驾驶执照、州颁发的身份证件、军人身份

^① David Autor et al. ,“Import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10, No. 10, 2020, pp. 3139-3183.

^② Leonardo Baccini and Stephen Weymouth, “Gone for Good: Deindustrialization, White Voter Backlash, and US Presidential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5, No. 2, 2021, pp. 550-567.

^③ Hernan J. Winkler, “The Effe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Evidence from European Regions, 2002—2014,” *Economics & Politics*, Vol. 31, No. 2, 2019, pp. 137-162.

^④ 宫小飞、袁征:《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实施效果与制约因素》,载《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6期,第59页。

证、部落身份证件等。^①一些把持州议会的政党也采用立法手段进行选民压制,例如缩短提前投票期限、加大曾犯有重罪者参加选举的障碍等。^②这些对选民要求严苛的州往往是由共和党主导的。有研究者发现,严格选民身份认证法对少数族裔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对白人更加显著;初选中拉美裔、非裔、亚裔及多种族美国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大选中拉美裔受影响程度则更为严重。^③总体而言,这些做法对各州选民的投票率都产生了显著且持续的负面影响。^④在此背景下,选举结果难以真实反映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参与投票的选民群体趋于同质化,驱动着政治极化程度加深。^⑤

与此同时,学者们还注意到初选制类型对极化的影响。在封闭式初选中,参与投票的选民意识形态往往更为极端,这有利于帮助极端候选人脱颖而出;而在开放式初选中由于非本党派或独立选民享有投票权,他们可以通过提名温和候选人来降低极化程度。^⑥有学者甚至主张取缔封闭式初选制以应对严峻的极化现象。^⑦然而,也有研究以加利福尼亚州的前两名初选制

①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 “Voter ID Laws,” <https://www.ncsl.org/elections-and-campaigns/voter-id>, 访问时间:2024年2月1日。

② 倪春纳:《反民主的实验室:联邦制、政治极化与美国民主》,载《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6期,第177页。

③ Zoltan Hajnal, Nazita Lajevardi and Lindsay Nielson, “Voter Identification Laws and the Suppression of Minority Vot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9, No. 2, 2017, pp. 363-379.

④ Melanie J. Springer, “State Electoral Institutions and Voter Turnout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920—2000,” *State Politics & Policy Quarterly*, Vol. 12, No. 3, 2012, pp. 252-283.

⑤ 倪春纳:《选举制度如何放大美国的政治极化——对选民整体极化论的质疑》,载《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2期,第82—83页。

⑥ Nolan M. McCarty, “The Limits of Electoral and Legislative Reform in Addressing Polarization,”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99, No. 2, 2011, pp. 359-372; James A. McCann, “Nomination Politics and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Assessing the Attitudinal Effects of Campaign Involve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Vo. 57, No. 1, 1995, pp. 101-120; 周淑真、穆若曦:《试论美国现实的宪政危机及困境——基于2016年以来政党政治演变的考察》,载《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5期,第79—80页。

⑦ Elaine C. Kamarck, “Solutions to Polarization,” in Nathaniel Persily ed., *Solutions to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96-97.

(Top Two Primary)为例对初选制类型进行考察,发现开放式初选制并未起到缓和极化的效果。^①由此观之,初选制度对极化的影响仍有争议。鉴于以投票便利度为重点的选举政策或将影响选民参与选举程度,继而改变极化水平,本文提出:

假设3:一个州的投票便利度越低,该州议会的极化程度越高。

五、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分四部分展开。首先,本文在变量测量部分介绍了变量选择及处理方式。其次,讨论了本研究估计策略及估计结果。再次,在机制分析部分,本文对三个假说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并基于比较案例提供经验证据。最后,稳健性检验部分探讨了模型结果在不同变量测量、估计策略设定下的变化情况。

(一) 变量测量

考虑到人口结构等变量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州议会数据的可用性,本文考察的是2010—2020年州众议院极化的影响因素。由于内布拉斯加州议会采用一院制且该州议员不代表政党,因此剔除内布拉斯加州,仅对49个州进行分析。本文搜集并整理的数据为平衡面板数据,针对所使用的时间序列数据的个别缺失值,在实证分析前,已采用线性插值法对其进行填补。

本文的因变量为美国各州众议院极化程度。已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州议会极化的测量方式。丹尼尔·科菲(Daniel J. Coffey)将各州政党党纲作为衡量州极化程度的标准,^②但这一方式较为主观且只包含2000—2002年的党纲数据,故本文选择学界较为公允的极化测度方式,即众议院内两党意识形态中位数之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各州立法机构议员意识形态

^① Thad Kousser, Justin H. Phillips and Boris Shor, “Reform and Representation: A New Method Applied to Recent Electoral Changes,”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Vol. 6, No. 4, 2018, pp. 809-827.

^② Daniel J. Coffey, “Federal Parties and Polarization,” in John C. Green, Daniel J. Coffey and David B. Cohen, eds., *The State of the Parties: The Changing Rol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arti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pp. 113-125.

态汇总数据”，这一数据库由肖尔和麦卡蒂在 2011 年首次创建，于 2023 年 4 月进行更新，^①是目前最全面的州议会意识形态数据库。议员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为负值，值越小，越自由；同理，政治意识形态保守为正值，值越大，越保守。

根据前文所述，本文有以下三个核心解释变量：身份政治（包括族群多样性和非法移民数量）、制造业规模、投票便利度。

首先，据上文讨论的身份政治现象，美国的身份认同既涉及少数族裔也涉及移民，故本文从族群多样性和非法移民（unauthorized immigrants）两方面开展分析。族群结构多样性参考了学界普遍的衡量方式，^②数据范围在 0 到 1 之间，其中 0 代表绝对同质，接近 1 表示人口结构非常多样化。各州各族群占总人口比例的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每一年的调查。^③ 非法移民变量来自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各州非法移民数量，^④考虑到数据分布具有偏向性，本文对非法移民数量取自然对数。

其次，就制造业规模而言，本文选取各州传统制造业从业人口占比作为衡量标准，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⑤ 人口普查局每年都会启动美国社

① Boris Shor, “Individual State Legislator Shor-McCarty Ideology Data, April 2023 Update,”<https://doi.org/10.7910/DVN/NWSYOS>,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2 日。

② 本文参考 Rodney E. Hero and Caroline Tolbert, “A Racial/Ethnic 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s and Policy in the States of the U. 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40, 1996, pp. 851-871, 族群多样性的计算表达式为： $Diversity_{i,t} = 1 - \sum (Group_{i,t})^2$ 其中， $Diversity_{i,t}$ 为族群多样性， $Group_{i,t}$ 为州内各种族/族裔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本文在计算多样性指数时一共考虑了八个种族/族裔群体：非拉丁裔白人、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亚裔、印第安和阿拉斯加土著、夏威夷和其他太平洋岛民、其他单一种族、两个及以上种族。

③ U. S. Census Bureau,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ACS Demographic And Housing Estimates,” [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DP5Y2020.DP05?q=Older%20Population&g=010XX00US\\$0400000](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DP5Y2020.DP05?q=Older%20Population&g=010XX00US$0400000),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1 日。

④ Pew Research Center, “What We Know about Unauthorized Immigrants Living in the U. S.,”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11/16/what-we-know-about-unauthorized-immigrants-living-in-the-us/#:~:text=As%20of%202021%2C%20the%20nation's,1.75%20million%2C%20or%2014%25>,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1 日。

⑤ U. S. Census Bureau,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Selecte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DP5Y2020.DP03?q=industry&t=Industry&g=010XX00US\\$0400000&moe=false&tp=true](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DP5Y2020.DP03?q=industry&t=Industry&g=010XX00US$0400000&moe=false&tp=true),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2 日。

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ACS),调查内容包含各产业从业人口数据。由于制造业从业人口占比呈偏态分布,本文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

最后,各州的投票便利度重点关注州政府是否压制选民投票权以及有效促进选民参与热情。麻省理工学院选举与数据科学实验室(MEDSL)构建了客观衡量各州选举管理政策和运作情况的数据集,基于选举环境、选举基础设施及管理、邮件投票管理、现场投票管理四个维度的数据统计出各州选举绩效指数(Election Performance Index, EPI)这一综合性指标。^① 选举环境依据选民投票率和选民登记率进行衡量;选举基础设施及管理的测量包括数据完整性、是否提供在线选民登记、在线投票信息查找便利度、投票机器运行等;邮件投票管理是指邮寄选票未返回率和被拒绝率及军队和海外选票未返回率和被拒绝率;现场投票管理则通过残疾人士投票便捷性、临时选票使用率和投票等待时长来衡量。^② 该变量为连续变量,数据范围为0~1,数值越大表明州选举便利程度越大。

为避免因遗漏变量而导致模型估计结果的偏差,本文在实证分析部分进一步加入了相关控制变量,并对相关变量的赋值进行处理。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三个面向:经济、人口统计学和党派因素。首先,经济类控制变量由各州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水平组成。就产业结构的测量而言,除了核心变量中的制造业,本研究还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建筑业纳入考量,前者选择各州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占比数据,包括农业、林业、渔业、矿业等,后者选择各州建筑业从业人口占比数据。由于两个变量皆呈偏态分布,本文选择取其对数值。数据均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③ 经济水平的衡量包含各州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相对前一年的增幅以及人均收入水平,前一数据来自

^① MIT Elections Data and Science Lab, “2024, Elections Performance Index,”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verse/epi_all, 访问时间:2024年9月2日。

^② MIT Elections Data and Science Lab, “2022 Update to the EPI Methodology,” https://elections-blog.mit.edu/sites/default/files/2024-03/epi_methodology_2022.pdf, 访问时间:2024年9月2日。

^③ U.S. Census Bureau,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Selecte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DP5Y2020.DP03?g=010XX00US\\$0400000&moe=false&tp=true](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DP5Y2020.DP03?g=010XX00US$0400000&moe=false&tp=true), 访问时间:2024年9月2日。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后一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① 其次,各州人口统计学特征选取各州人口数量、中位人口年龄变量、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以衡量各州人口规模、教育程度及中位年龄,数据来自人口普查局。^② 最后,考虑到各州的政党竞争强度可能与极化程度相关,本研究加入了相关变量。诸多学者对政党竞争激烈程度的测量开展过研究。^③ 本文采用兰尼指数衡量方式,^④ 通过从美国州议会协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搜集2010—2020年各州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所占席位的百分比,^⑤ 从美国投票百科全书(Ballotpedia)搜集各州州长候选人普选得票率,^⑥ 计算出各州政党竞争程度,取值区间为0.5~1,意味着从没有竞争到充分竞争。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①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Regional Data: GDP and Personal Income,” <https://apps.bea.gov/itable/?ReqID=70&step=1&acrdn=1#eyJhcHBpZCI6NzAsInN0ZXBzIjpBMswyOSwyNSwzMSwyNl0sImRhdGEiOltbllRhYmxlSWQiLCI1MzEiXSxbIk1ham9yX0FyZWEiLCIwl0sWyJTdGF0ZSIsWyIwl1dXX0=>, 访问时间:2024年9月2日; U. S. Census Bureau,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Per Capita Income in the Past 12 Months,” [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DT5Y2020.B19301?q=per%20capita%20income&g=010XX00US\\$0400000](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DT5Y2020.B19301?q=per%20capita%20income&g=010XX00US$0400000), 访问时间:2024年9月2日。

^② U. S. Census Bureau,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ACS Demographic and Housing Estimates,” [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DP5Y2020.DP05?q=age&g=010XX00US\\$0400000](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DP5Y2020.DP05?q=age&g=010XX00US$0400000), 访问时间:2024年9月3日; U. S. Census Bureau, “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data.census.gov/table?q=foreign&g=010XX00US\\$0400000](https://data.census.gov/table?q=foreign&g=010XX00US$0400000), 访问时间:2024年9月3日。

^③ 奥斯汀·兰尼(Austin Ranney)开创的政党间竞争度量指数(又称兰尼指数)是学界广泛使用的指标,兰尼指数包括:一党在一届议会两院中分别所占席位比例、一党州长候选人普选得票率以及该党同时控制府会的比率。Austin Ranney, “Parties in State Politics,” in Herbert Jacob and Kenneth Vines, eds., *Politics in the American State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76, pp. 61-99.

^④ 本文中政党竞争强度计算方式如下: $Competition_{i,t} = 1 - |(0.5 - Democrats_{i,t})|$, 其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国家与年份, $Competition_{i,t}$ 为政党竞争强度, $Democrats_{i,t}$ 为各州民主党人在州政府担任职能所占百分比。

^⑤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 “State Partisan Composition,” <https://www.ncsl.org/about-state-legislatures/state-partisan-composition>, 访问时间:2024年9月1日。

^⑥ Ballotpedia, “Gubernatorial elections,” https://ballotpedia.org/Gubernatorial_elections, 访问时间:2024年9月1日。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众议院极化程度	539	1.648	0.511	0.348	3.209
自变量					
族群多样性	539	0.436	0.158	0.097	0.760
非法移民数量	539	11.263	1.553	8.517	14.732
投票便利度	539	0.716	0.092	0.368	0.900
Ln(制造业从业人口占比)	539	-2.361	0.429	-3.540	-1.661
控制变量					
Ln(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占比)	539	-3.964	0.838	-5.809	-2.064
Ln(建筑业从业人口占比)	539	-2.716	0.133	-3.037	-2.386
人均收入水平	539	4.691	0.600	3.451	6.750
地区生产总值增幅	539	0.013	0.025	-0.115	0.224
人口数量	539	15.206	1.017	13.245	17.493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	539	0.292	0.052	0.173	0.445
中位年龄	539	37.984	2.350	28.800	44.800
政党竞争强度	539	0.809	0.094	0.552	0.999

(二) 模型与结果

由于州议会的极化在地理分布上并非随机,相邻地域的州也有着更为相似的价值底色和政党倾向,因此本文除对全样本进行回归外,还进一步将总群样本划分为东北部、中西部、南部和西部州四个分群样本,^①以对比不同

① 根据美国地理划分,东部地区: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南部地区: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弗吉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得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中西部地区: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艾奥瓦州、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怀俄明州、科罗拉多州。西部地区: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斯加州、爱达荷州、犹他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

地区极化的影响因素及差异。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计算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检验出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使用的面板数据在使用豪斯曼检验后判别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相关,并且考虑到样本时间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前后的年份间存在不随个体变化的时间异质性,故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各州极化水平的影响因素。

表2直观呈现了模型估计结果,从回归结果可知,核心自变量对州极化具有显著的影响。

表2 州众议院极化程度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全样本	西部	中西部	东北部	南部
族群多样性	-1.169 ** (-2.06)	-0.803 (-0.55)	0.046 (0.03)	-0.278 (-0.40)	-1.320 (-1.32)
非法移民数量	0.008 (0.21)	-0.018 (-0.19)	-0.005 (-0.05)	0.110 ** (2.6)	0.077 (1.02)
投票便利度	-0.223 ** (-2.13)	-1.061 *** (-2.80)	-0.309 (-0.77)	-0.159 (-1.50)	-0.334 ** (-2.55)
Ln(制造业从业人口占比)	-0.396 *** (-3.31)	-0.965 *** (-3.64)	-0.333 (-0.65)	0.562 ** (2.3)	-0.399 (-1.47)
Ln(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占比)	-0.060 (-0.84)	0.576 ** (-2.16)	-0.111 (-0.33)	0.033 (-0.57)	-0.167 (-1.58)
Ln(建筑业从业人口占比)	-0.181 (-1.52)	-0.411 (-1.16)	-0.618 (-1.30)	0.537 *** (2.97)	0.304 (1.31)
人均收入水平	-0.047 (-1.16)	0.052 (0.44)	-0.213 * (-1.69)	0.047 (0.98)	-0.073 (-1.04)
地区生产总值增幅	0.219 (1.01)	0.073 (0.12)	0.281 (0.62)	0.344 (1.0)	-0.007 (-0.02)
人口数量	0.955 *** (4.11)	1.952 *** (2.66)	-0.467 (-0.28)	-1.566 ** (-2.54)	0.340 (0.75)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	0.586 (0.43)	-0.103 (-0.03)	5.889 (0.83)	0.470 (0.35)	1.013 (0.39)

续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全样本	西部	中西部	东北部	南部
中位年龄	0.048 *** (3.14)	0.014 (0.26)	0.051 (0.79)	0.081 *** (4.15)	-0.025 (-0.77)
政党竞争强度	-0.069 (-1.17)	0.031 (0.19)	0.019 (0.12)	-0.052 (-0.98)	-0.242 ** (-2.47)
常数项	-15.748 *** (-4.27)	-28.139 *** (-2.65)	3.627 (0.14)	23.149 ** (2.55)	-3.610 (-0.51)
固定州	√	√	√	√	√
固定年份	√	√	√	√	√
样本量	539	143	121	99	176
R^2	0.516	0.608	0.326	0.829	0.767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首先,身份政治方面,各州族群多样性的估计系数在 95% 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族裔构成是影响极化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各州非法移民数量对州众议院极化的估计结果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换言之,虽同处于身份政治框架之下,移民群体与极化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高。

其次,模型显示制造业规模的回归系数在 99%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即随着州内制造业从业人口减少,州议会的极化程度加深;这意味着制造业萎缩对极化水平具有突出的扩大效应。

再次,从表中可见,投票便利度对州极化的影响在 9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其估计系数为 -0.223,表明一州的选举政策对选民越是友好,该州众议院极化程度越低。研究结果支持假设 3。

最后,针对控制变量,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州内人口数量及中位年龄与极化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方面,地区生产总值增幅、第一产业和建筑业规模、人均收入对州众议院的极化程度都没有显著作用;州内政党竞争激烈与否也不对极化产生显著影响。

如前所述,各州在地域上呈现出集中化特征,因此有必要对地区异质性进行区分并展开探讨。选民的投票便利度对极化的影响在四个地区与全样

本基本相似,但在西部和南部地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估计系数则不显著。制造业从业人口的估计系数在西部地区高度显著为负,而在东北部州却显著为正。值得注意的是,全样本中显著为负的族群多样性在分组回归中均不显著。对此,本文以东北部地区作为对照,引入西部、中西部和南部与族群多样性的交互项之后发现,族群多样性与南部和西部地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族群多样性对极化的负向作用在南部和西部州受到抑制;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族群多样性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此外,非法移民数量在东北部的州对极化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发现,核心变量在美国不同地区对极化程度产生差异化影响,并且在美国东北部的州具有最高解释力。

(三) 机制分析

在前述结论基础上,本部分将进一步分析州的族群多样性、制造业规模和选举政策何以影响州众议院极化程度。

首先,族群多样化对极化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州内族群结构越单一,白人群体越多,极化程度越深。存在这种影响可能的逻辑如下:其一,白人男性基督徒往往被视作“最典型美国人”形象,^①但随着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当他们感知到自己所处群体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地位焦虑促使他们采取更为保守、极端的政治立场,以维护既得利益、捍卫被威胁的社会地位。^②此外,同样是奔赴美国梦,其他群体却可以因为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合理“插队”,这让白人感到失落和愤懑,从中经历的相对剥夺感点燃了他们的保守主义情绪。^③其二,人口结构单一的地区更容易出现“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即拥有相似政治态度的人会在互动中不断强化彼此的观点。州内白人群体的聚集因而导致极端意识形态更易传播,加剧政治

^① Elizabeth Theiss-Morse, *Who Counts as an American? The Boundaries of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63-94.

^② Diana C. Mutz, “Status Threat, Not Economic Hardship, Explains the 2016 Presidential Vot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15, No. 19, 2018.

^③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6, pp. 221-222.

极化水平。

其次,制造业衰落加深极化程度。自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繁荣期后,美国制造业逐渐进入空心化阶段,虽然近年来有所回流,但在长时段内制造业工人面临着失业、降薪等诸多问题。在工薪阶层看来,经济全球化正是他们身处艰难困境的原因。面对经济上的失意,他们选择拥抱反全球化等保守主义理念,诉诸种族主义话语、本土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等一系列言辞,^①进而加剧极化水平。除此之外,美国两党为赢得选举竞相争抢蓝领阶层的选票。共和党内部保守派力图发展一种本土主义政治,民主党内部也有越来越多政治家和战略家呼吁候选人使用民粹主义措辞。^②可以说,美国内产业结构变化,特别是制造业的衰退,就是政治裂隙的根源。^③

最后,选举时投票便利度越高,极化水平越低。如图 6 所示,箭头表示作用力方向,线条表示核心机制。各州推行的选举政策通过改变参与选举的便利度影响选民的投票积极性。降低选民投票意愿的做法诸如:在选民登记流程中提早登记截止日期、禁止线上注册等;在投票环节缩短提前投票期限,设置邮寄选票申请要求;^④以公共财政预算为由减少、关闭或迁移专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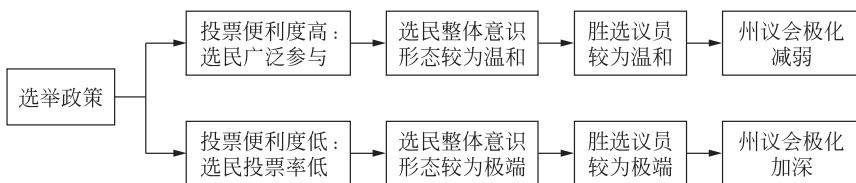


图 6 投票便利度与极化水平的因果逻辑

注:作者自制。

① 黄琪轩:《去工业化中的失落者:美国保守主义兴起的选民基础》,载《文化纵横》,2022 年第 6 期,第 58—60 页。

② 吴泽林、尚修丞:《拜登政府重振本土制造业:进展与评估》,载《现代国际关系》,2023 年第 4 期,第 88—89 页。

③ 雷少华:《全球产业结构变迁与政治裂隙》,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第 71—74 页。

④ Voting Rights Lab, “Issue Areas,” <https://tracker.votingrightslab.org/issues>,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0 日。

少数族裔选民设立的投票站或登记处。^① 美国的选举活动大多在工作日举行,选民投票热情本就普遍不高,投票程序复杂化和投票成本增加致使投票率更为低迷。在有资格、有意愿投票的选民基数较少的情况下,选举参与者往往以政治活跃分子为主,他们的政治观点鲜明,政党认同强烈,意识形态极化。从理性选择角度出发,州议员候选人为吸引活跃分子的选票会迎合他们的理念,较少顾及中间选民的立场。^② 可以说,政党活跃分子在塑造所属党派候选人的议程、推动政党及候选人偏离中间立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③ 与此同时,相对于温和派候选人,积极参与政治者也会倾向于选择更加意识形态化的同党派候选人。由此观之,党内积极分子驱动的候选人筛选过程推动着议员政策立场更加激进,民主党州议员自由化,共和党州议员保守化,意识形态极端化的州议员所组成的州议会也随之两极分化。

接下来,本文将选取明尼苏达州与密歇根州作为两个案例来剖析相关作用机制。之所以选择这两州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它们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经济水平等方面相似性。具体而言,两州都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铁锈地带”,靠近五大湖,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2010—2020年,明尼苏达州和密歇根州的经济规模、经济增速接近,^④ 前者人口数量在全美排名第二十二,后者排名第十。^⑤ 除此之外,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两州皆不占据绝对优势。然而,尽管两州在上述方面高度相似,明尼苏达州的极化程度却远高

^① 郭馨怡:《美国2020年大选两党围绕选举权问题的争斗》,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1期,第150页。

^② Nelson W. Polsby and Aaron Wildavsky,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trategies of American Electoral Politic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 1984, pp. 104-105.

^③ Geoffrey C. Layman et al., “Activists and Conflict Extension in American Party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4, No. 2, 2010, pp. 324-346.

^④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Regional Data: GDP and Personal Income,” <https://apps.bea.gov/itable/?ReqID=70&step=1&acrdn=1#eyJhcHBpZCI6NzAsInN0ZXBzIjpMSwyOSwyNSwzMSwyNl0sImRhdGEiOltbIlRhYmxlSWQilCI1MzEiXSxbIk1ham9yX0FyZWEiLCIwIl0sWyJTdGF0ZSIsWyIwIl1dXX0=>, 访问时间:2024年9月4日。

^⑤ U. S. Census Bureau,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ACS Demographic And Housing Estimates,” [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DP5Y2020.DP05?q=Older%20Population&g=010XX00US\\$0400000](https://data.census.gov/table/ACSDP5Y2020.DP05?q=Older%20Population&g=010XX00US$0400000), 访问时间:2024年9月4日。

于密歇根州,故选择这两州能为印证上文理论机制提供经验证据。

相较于明尼苏达州较为单一的族群构成,密歇根州族群多样性更高,州内非裔美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比明尼苏达州高出 10%。制造业方面,两州虽然都曾遭遇传统制造业衰落,面临就业机会减少、蓝领群体工资降低等挑战,但密歇根州在过去十年间采取的产业回流政策取得显著成效。密歇根州通过颁布个人财产税减免、增加技术工人培训、改革工人赔偿制度、减少监管障碍等一系列法案,从多方面入手有效复苏了制造业。^① 截至 2021 年,密歇根州制造业产值高达 1.013 千亿美元,制造业就业人口 58.7 万人;明尼苏达州制造业产值则为 531 亿美元,就业人口为 32 万,制造业恢复乏力。^② 在投票便利度上,自 2018 年以来,密歇根州实施了一系列选举政策改革措施,包括:为合格选民提供在线注册渠道;允许选民无理由请求邮寄选票;改善军事人员邮寄选票流程;加强对选举后审计程序和选举认证的保护等等。随着改革成功推行,密歇根州的选民登记率和投票率均显著提高,黑人和白人选民之间的登记率和投票率差距也明显缩小。^③

数据显示,2010—2020 年,明尼苏达州众议院极化程度由 1.98 大幅上升至 2.34,成为美国最极化的州之一;密歇根州由 1.67 小幅增长至 1.76,且密歇根州的极化水平甚至呈现过下降态势。通过对两州同时段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族裔构成、制造业规模和选举便利度与极化程度存在关联。

^① Michigan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A Look Back at Manufacturing’s Resurgent Decade,” <https://mimfg.org/Articles/a-look-back-at-manufacturings-resurgent-decade>,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10 日。

^②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Minnesota Manufacturing Facts,” <https://nam.org/state-manufacturing-data/2022-minnesota-manufacturing-facts/>,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10 日;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Michigan Manufacturing Facts,” <https://nam.org/state-manufacturing-data/2022-michigan-manufacturing-facts/>,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10 日;

^③ Greta Bedekovics and Ashleigh Macolek, “How Michigan Became a Blueprint for Strengthening Democracy,”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June, 2023,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3/06/MI-democracy-report.pdf>,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12 日。

(四) 稳健性检验

为确认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本文通过更换模型估计方法和自变量衡量方式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1、6、8展示的是仅添加了8个控制变量后的回归模型,模型2、7、9展示在控制变量基础上加入了4个核心解释变量后的回归模型。

1. 更换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在基准回归中,美国各州之间存在明显个体和时间差异,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解决个体和时间效应可能导致的问题。下文将分别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和多维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并比较各模型回归结果。

如表3所示,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多维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大致吻合,细微差别主要体现在回归系数之上。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不同,族群多样性在随机效应模型的显著水平更高,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中更低;投票便利度在随机效应模型的显著性则更低。由于个体之间的差异不随机无法满足随机效应模型的假定前提,并且本文使用的面板数据只有个体和时间两个维度不适用于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因此这两个模型的结果都存在偏差。整体而言,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得到了支持,同时也证明选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的必要性。

表3 州众议院极化影响因素的稳健性检验

	随机效应模型		多维固定效应模型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	模型2
族群多样性		-1.205 ***		-1.169 *		-1.169 **
		(0.36)		(0.611)		(0.568)
非法移民数量		-0.006		0.008		0.008
		(0.036)		(0.034)		(0.038)
投票便利度		-0.180 *		-0.223 **		-0.223 **
		(0.106)		(0.097)		(0.105)

续表

	随机效应模型		多维固定效应模型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	模型 2
Ln(制造业从业人口占比)		-0.366 ***		-0.396 ***		-0.396 ***
		-0.092		-0.138		-0.120
Ln(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占比)	0.193 *** (0.052)	0.138 *** (0.053)	-0.038 (0.062)	-0.060 -0.066 (0.071)	-0.060	
Ln(建筑业从业人口占比)	-0.152 (0.116)	-0.151 -0.115	-0.189 * -0.038	-0.181 -0.114	-0.181	
人均收入水平	-0.034 (0.038)	-0.043 (0.038)	-0.034 (0.056)	-0.047 (0.055)	-0.046 (0.04)	-0.047 (0.041)
地区生产总值增幅	0.456 ** (0.226)	0.428 * (0.222)	0.261 (0.263)	0.219 (0.261)	0.315 (0.218)	0.219 (0.218)
人口数量	0.282 *** (0.050)	0.404 *** (0.068)	0.876 *** (0.285)	0.955 *** (0.282)	0.852 *** (0.232)	0.955 *** (0.233)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	2.091 ** (0.875)	1.927 ** (0.9)	0.198 (1.889)	0.586 (1.78)	-0.332 (1.298)	0.586 (1.356)
中位年龄	0.033 *** (0.013)	0.025 * (0.013)	0.048 * (0.027)	0.048 * (0.028)	0.058 *** (0.013)	0.048 *** (0.015)
政党竞争强度	-0.068 (0.062)	-0.070 (0.061)	-0.052 (0.066)	-0.069 (0.066)	-0.059 (0.059)	-0.069 (0.059)
常数项	-4.016 *** (0.895)	-5.841 *** (0.998)	-14.030 *** (4.021)	-15.669 *** (3.809)	-13.244 *** (3.565)	-15.748 *** (3.691)
样本量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2. 更换自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选择对三个自变量进行变更。其一,由于白人数量越多意味着族群构成越单一,故本文选取了各州非拉丁裔白人单一种族占总人口比例作为族群多样性指数的替代性指标。其二,本文把对数处理后的各州产业人口占比变量替换为原先数值。其三,为规避选举和极化之间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州投票便利度变量作滞后一期处理。从表 4 可知,自变量的系

数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州的白人人口占比和投票便利度具有95%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制造业就业人口具有99%水平以上统计显著性。这意味着在替换自变量后,本文的结论仍然成立。稳健性检验结果充分支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4 州众议院极化影响因素的稳健性检验

	模型 10	模型 11
白人人口占比	1.471 ** (2.07)	
非法移民数量		-0.014 (-0.38)
投票便利度($t-1$)		-0.235 ** (-2.30)
制造业从业人口占比		-6.247 *** (-4.03)
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占比	-0.039 (-0.55)	-0.065 (-0.91)
建筑业从业人口占比	-2.618 (-1.59)	-3.037 * (-1.85)
人均收入水平	-0.043 (-1.06)	0.052 (0.44)
地区生产总值增幅	0.263 (1.19)	0.073 (0.12)
人口数量	0.882 *** (3.79)	1.952 *** -2.66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	0.405 (0.30)	(0.103) (-0.03)
中位年龄	0.053 *** (3.63)	0.014 (0.26)
政党竞争强度	-0.154 * (-1.80)	-0.122 (-1.44)

续表

	模型 10	模型 11
常数项	-13.614 *** (-3.77)	14.826 *** (-3.87)
固定州	√	√
固定年份	√	√
样本量	539	539
R^2	0.496	0.520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六、结语

政治极化现象是美国研究中的关键议题,立法机构作为政治活动的核心舞台之一,成为观察极化现象的重要窗口。尽管学界关于国会极化的研究已不胜枚举,但围绕州议会极化开展的研究仍显匮乏。为更加全面深入认识极化,本文选取美国各州众议院为研究对象,旨在系统考察州级层面极化现象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肖尔和麦卡蒂两位学者构建的州议会意识形态数据库,本文发现,在 1996—2020 年,尽管极化程度和极化趋势因州而异,但整体而言州议会的极化主要呈现出三种态势:缓慢上升、急剧上升以及保持稳定,只有怀俄明州和密歇根州两个州极化水平略微下降。将州议会与国会的极化相比,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极化程度持续加剧,且在 2010—2020 年增幅更为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国会中共和党右转幅度大于民主党左转幅度,而州议会的非对称极化体现为民主党议员的自由化程度大于共和党议员保守化程度。

由于美国州众议院极化的趋势在 2010—2020 年最为显著,本文选用该时间段面板数据,探索州层面极化形成原因和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制造业从业人口对州众议院的极化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即随着州内制造业衰落,州极化水平提高;族群结构变化对极化同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随着州内族群多样性降低,州的极化程度显著增加;州的投票便利度对极化程度同样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即选举便利度越低,极化程度越高。此外,本文通

通过对分群样本进行回归,发现以上因素对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州的解释力最强。

本文进一步探究了上述变量影响极化的内在机制,认为身份政治和经济上的冲击会导致白人及工薪阶层思想右转,加剧政治极化。与此同时,各州施行的选举政策影响选民参与程度,在选民数量较少时,仅政党活跃分子参与选举,这驱使议员候选人为赢得选举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立场和意识形态,从而加深州议会极化程度。明尼苏达州和密歇根州的比较案例分析也验证了上述理论,与回归结果基本相符。

鉴于政治极化已深深嵌入美国政治生态,未来研究可以双管齐下。一方面,在持续追踪各州议会极化走势的基础上,基于州的特殊性开展案例研究、分析社交媒体等因素在极化中发挥的作用,以期深化对极化形成机制的认知。同时,在州级政治全国化的背景下,虽然各州极化水平有所差异,但整体趋势较为相似,因此后续研究还可以对全国层面极化和州层面极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详尽的考察。

另一方面,后续研究可以探索更具前瞻性的议题。本文发现,尽管极化程度低的州,譬如罗得岛州、夏威夷州,州内政治分歧小、社会冲突少,但其面临经济水平有限等问题,而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等极化尤其严重的州不仅经济水平较为发达,而且其政府治理尚未失灵,民主崩溃风险也相对较低。因此,未来可以考察美国各州和联邦政府如何在极化背景下实现有效治理,以及他们为与极化长期共存、缓解极化消极影响所作出的努力与成效,这将有助于完善学界对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政治极化的认知。